



孔府珍藏

的御赐印章



文 / 孟继新 孟景



御赐“钦承圣绪”印

所谓“御赐印章”，是指在印面上出现“御赐”二字的印章，除此之外，印中所刻的印文也必须是皇帝亲颁之语。这种印章是孔府内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珍藏之一，它不仅是朝廷与孔府密切关系的佐证，也是皇帝与衍圣公密切关系的佐证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御赐印章，我们以“钦承圣绪”和“诗书礼乐”两印为例，做一番具体的分析。

御赐“钦承圣绪”印，青田石质。印面正方形，上部篆刻阳文“御赐”二字；中部篆刻阴文“钦承圣绪”四字，四字以“田”字格均匀排列；印面左右竖刻两龙，龙身细长，四肢夸张，龙头伸向印面顶部与“御赐”二字相接；龙尾曲屈盘绕在印面下部，并有云朵相衬；印章右侧刻有隶书题款，文亦为“钦承圣绪”四字。

据《曲阜县志·通编》记载：清雍正三年“秋八月，阙里孔子庙兴工，赐衍圣公孔传铎‘钦承圣绪’匾。”由此可知，“钦承圣绪”四字，原是清雍正皇帝胤禛，在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颁赐给孔子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传铎的匾额。

雍正皇帝胤禛是一位尊孔崇儒的皇帝。早在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十五岁的胤禛就以王子的身份，随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。即位后，马上下诏追封孔子五代先祖王爵，他说：“至圣先师孔子，道冠古今，德参天地，树百王之模范，立万世之宗师，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。而水源木本，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，则圣人之祖考，宜应崇厚之褒封。所以追溯前徽，不忘所自也。粤稽旧制，孔子之父叔梁纥于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，自宋以后，历代遵循。而叔梁纥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，亦未奉祀祠庭。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，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，意欲追封五代，并享蒸尝，用伸景仰之诚，庶慰羹墙之慕。”（《曲阜县志·通编》）于是，在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六月十二日，诏奉：孔子的五世先祖木金父为肇圣王，孔子的高祖祁父为裕圣王，孔子的曾祖防叔为诒圣王，孔子的祖父伯夏为昌圣王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启圣王。而且还立了专祠，享受与孔子一样的供奉。
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六月，阙里孔庙因雷击起火，大成殿等孔庙主要建筑被烧成废墟。孔传铎向朝廷急奏，皇帝胤禛闻奏后，大为震恐，进行了深深地思考：“朕惟孔子道高德厚，为万世师表，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，与天地同其悠久。朕临御以来，思极尊崇之典，用伸仰止之忱。今阙里圣庙被灾，岂朕尊师重道之心诚有未至欤？”（《曲阜县志·通编》）于是，他素服斋居，无庸更事，减膳撤乐，并亲诣国学文庙虔申祭奠，宣读告文，以展不安之心。同时决定，拨下帑银，重新修建阙里孔庙。
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八月，阙里孔庙兴工。雍正皇帝胤禛对修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他下了一道谕令：“凡殿庑制度规模，以至祭祀仪物，皆令绘图呈览，朕亲为指授。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胤禛给衍圣公孔传铎亲自颁题了“钦承圣绪”的匾额，这无疑是对圣裔的莫大慰藉和鼓舞。

其时，雍正皇帝胤禛颁给孔传铎的这块“钦承圣绪”匾额，还有另一层意义，也就是说，等于是在孔传铎头上戴上了一顶至荣至幸的贵冠。孔传铎对此自是心知肚明，于是，把匾额高高悬挂于孔府二堂之上，并刻以为印，以便在郑重场合和重大事宜中适时用印。

“钦承圣绪”这四个字，意义深刻。

这里的“钦”字，应当包含两层意思。其一，指明这是皇帝所作出的决定；其二，应有敬重或敬仰的意思。如韩愈《孟生》诗中有：“我论徐方牧，好古天下钦。”又如《晋书·陶潜传》：“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，甚钦迟

之。”

“承”，即接续、继承。如《后汉书·儒林传赞》：“斯文未陵，亦各有承。”柳宗元《封建论》中有：“魏之承汉也，封爵犹建。”孙楚《为石仲容与孙皓书》：“公孙渊承籍父兄，世居东裔。”

“圣”，是对孔子的称谓。早在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就把孔子称为“至圣”。唐太宗贞观二年（628年）尊孔子为“先圣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加号孔子为“玄圣文宣王”，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年）又号称孔子为“至圣文宣王”。元武帝大德十一年（1303年）加号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明世宗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号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加号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又称“至圣先师”。

“绪”，连绵不断。意思是说，将前人事业延续下去。如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：“缙禹之绪。”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武王缙太王王季文王之绪。”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仆赖先人绪业，得待罪辇轂下。”

从胤禛颁赐给孔传铎的这四个字上，不难看出，这位雍正皇帝对圣人后裔的态度是非同一般的。应当说，这种态度，是源于他的尊孔崇儒之心。

在尊孔崇儒这方面，胤禛不单单颁赐了匾额及重修阙里孔庙，更主要的还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《论语》的认识上。

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七月十九日，胤禛以孔子《论语》一书，裨益政治，立教垂训，道大功隆。特发诏谕进行表彰，他说：“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，集群圣之大成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相传之道，具于经籍者，赖孔子纂述修明之。而《鲁论》一书，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，使万世之伦纪以明，万世之名份以辨，万世之人心以正，万世之风俗以端。若无孔子之教，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，昧于民彝物则之理。势必以小加大，以少凌长，以贱妨贵，尊卑倒置，上下无等，干名犯分，越礼悖义。所谓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吾得而食诸。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可胜言哉。惟有孔子之教，为人道之大经，彝伦之至理。昭然如日月之丽天，江河之行地。历世愈久，其道弥彰。统智愚贤不肖之俦，无有能越其范围者。纲维既立，而人无踰闲荡检之事，在君上尤受其益。《易》曰：‘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’《礼运》曰：‘礼达而分定。’使非孔子立教垂训，则上下何以辨，礼制何以达，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，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。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，亦何以建极于上，而表正万邦乎。人第知孔子之教，在明伦纪，辨名分，正人心，端风俗。而知伦纪既明，名分既辨，人心既正，风俗既端，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。朕故表而出之，以见孔子之道之大，而孔子之功之隆也。”（《孔府档案》四

九九八之七)可以看出,他对孔子思想和《论语》一书,是多么推崇备至。

接下来,我们再谈谈“诗书礼乐”印章。

御赐“诗书礼乐”印,黑寿山石质。这枚印章原为明代孔府旧存,印高7.5厘米,印面为椭圆形,长6.6厘米,宽3.6厘米。印章通体黑色,上浮雕人物山景,系明代雕刻。清乾隆时,重刻了印面上的文字。印面上部篆刻阴文“御赐”二字,中部篆刻阳文“诗书礼乐”四字,四字竖排一行。印面左右竖刻两龙,龙身细长,四肢夸张。龙头伸向印面顶部,两龙各举起一上肢,作护卫“御赐”二字状。龙尾曲屈盘绕在印面下部,以作衬托。



御赐“诗书礼乐”印印面

“诗书礼乐”是清乾隆皇帝弘历御书颁赐给孔府的匾额。大家知道,弘历也是一位尊孔崇儒的皇帝,在位六十年,曾先后九次来曲阜进行朝圣活动。他与孔子七十代孙衍圣公孔广燾、七十一代孙衍圣公孔昭焕、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,都有过交往。

弘历每次到曲阜,都留下了许多御诗,当我们仔细阅读过这些诗作后,会很容易发现,诗、书、礼、乐这四个字,在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。在他看来,这四个字大概用在孔子门前是再适宜不过的了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正月,弘历第四次驾临曲阜时,赐衍圣公孔昭焕诗一首,诗曰:“驿路趋迎领一门,诗书教泽洵渊源。卿来处早予心往,大礼方行不欲烦。”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二月,弘历第六次驾临曲阜时,在他写的几首御诗中,更是处处可以看到“诗”、“书”、“礼”、“乐”的字迹。

《孔子手植桧赞》:“礼乐诗书地,星辰日月天。岂因树存没,直共道留传。补植谓多矣,重生或信焉。高低敷叶纒,左右互皮缠。奠茆霏精气,焚檀引庆烟。真羸灵五百,即是字三千。”

《诗礼堂赞》:“趋庭那有异闻奇,亦曰学诗学礼宜。闻一得三陈亢喜,似知之却未知之。”

《金丝堂赞》:“礼乐诗书,金丝万古。岂系鲁恭,广宅斯举。在左移西,亦惟其所。悬囊乃神,夫子不语。”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二月,弘历第八次驾临曲阜,赐衍圣公孔宪培诗一首:“久住京师学问藿,言归承祭圣人乡。亲仪慎勿仍其短,祖德恩准衍以长。修己无过守礼乐,睦宗旨在率端方。卅年两见崇公袭,怅忆人生曷有常。”

弘历何以乐此不疲地反复使用诗、书、礼、乐这几个字呢?为搞清其中原因,我们还是先从这几个字的字意上进行一下分析。

“诗”,即《诗经》,儒家经典之一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: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。及于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后稷,中述殷盛,至幽厉之缺。”因此,《诗经》系孔子用礼义为标准对古诗的选编。

《诗》是孔子教授学生的重要科目和经典。他说:“不学诗,无以言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而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他还主张将学诗与通达政事结合起来,以为“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,亦奚以为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孔子还经常与弟子们在一起谈诗评诗,有一次子贡问:“《诗》云: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’,其斯之谓与?”孔子说:“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又如子夏问曰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,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: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

《诗经》里的作品上迄西周初年,下至春秋中叶,地域包括现在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及甘肃的南部,代表了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,反映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,诸如社会生活,典章制度,风俗习惯以及各阶级各阶层的精神面貌,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资料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同时,《诗经》又集音乐、诗歌于一体,具有很高的音乐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。

“书”,即《尚书》,儒家经典之一。《史记·孔子

世家》说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阙。追述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迄于秦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言明《尚书》为孔子编定。但其中若干篇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等，为以后儒家所增。

《尚书》为孔子传授学生的主要典籍，也是孔子常常谈到的典籍。“子所雅言《诗》、《书》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参政，孔子引《尚书》所说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《尚书》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其史料价值很高，可以与甲骨文或金文互相参证。因其成书年代较早，文词古奥，语言质朴，既难诵读，又难理解，因此历代为此书作者者极多。

“礼”，即《仪礼》，儒家经典之一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说：“诸学者多言《礼》，而鲁高唐生最本。《礼》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。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唐生能言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礼古经者，出于鲁淹中及孔氏。”认为《仪礼》是孔子编成。

《仪礼》全书十七篇，内容包括冠、婚、丧、祭、射、乡、朝、聘等方面的基本仪节，不仅反映了周代的典礼活动、吉凶婚丧、亲族关系和宗教思想等，而且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。

“乐”，即《乐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。《庄子·天运》曰：“（孔）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班固在《汉书·武帝纪赞》中说：“孝武初立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章《六经》。”颜师古注：“《六经》，谓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也。”

由于《乐》已亡佚，因此关于《乐》是否有“经”引起后人争论。有人以为《乐》本有经，因秦焚书而亡佚，如《宋书·乐志》有：“及秦焚典籍，《乐经》用亡。”然孔子向以礼、乐并举，即使大难临头，仍安然弦歌。孔子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又说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司马迁说：“《诗》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《礼》、《乐》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这些记载，足证《乐经》之成，必定得力于孔子。今存《礼记》中《乐记》，《史记》中之《乐书》，或保存了古代《乐经》的部分内容与理论观点。

通过以上对诗、书、礼、乐的了解，很自然地看出，这四个字，字字都与孔子紧密相连。乾隆皇帝弘历把这么

一块匾额赐予孔府，确实是很合适的。

这块匾额颁赐的时间，应当是在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弘历第一次驾临曲阜时。弘历在孔庙举行释奠大礼，三献九拜。释奠后，又御诗礼堂讲筵。而后驾幸孔林酌酒，行一跪三叩头礼。旋即诣少昊陵致祭，周公庙拈香。还驾行宫后，赐十三氏子孙席宴。亲笔御书孔庙门榜、联额。又诏内阁“具成例”留曲柄黄伞于庙中。

弘历尤其对恭导圣驾的衍圣公孔昭焕，更是温语有加，殷勤垂问所习，孔昭焕以《诗经》对，弘历赐诗曰：“历代崇阶首百僚，欣看弱冠著清标。学诗适合趋庭训，读礼因迟望阙朝。泗水溯沿长不绝，尼山景仰近匪遥。圣言广大求亲切，守贵由来在不骄。”

弘历还特谕孔昭焕曰：“先师修道立教天下，万世之人服习圣训，咸有以自善其身，况为其子孙者乎。卿以宗裔奉祀绍封列爵，既优崇矣，当思渊源何自，夙夜敬勉，亲师向学，以植始基，慎行谨言，以培德器，循循诗礼之教，异日卓然有所成就，允孚令望，表率族党，俾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。”（《曲阜县志·通编》）就是在这次谈话后，弘历为孔昭焕写下了“诗书礼乐”匾额。此后，孔昭焕又以御赐“诗书礼乐”四字刻以为印。

